

世纪印象

百名学者 论中国文化

朱 竞 / 编著

(上)

 华龄出版社

世纪印象

——百名学者论中国文化

朱 竞/编著

(上 册)

 华龄出版社

访问者手记

说起来,已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了。当时《文艺争鸣》杂志开设了一个栏目叫《世纪印象》,邀请一些与世纪同龄的作家、批评家、学者谈他们对自己几乎一生都在其中度过的这个世纪的印象和看法。冰心、萧乾、季羡林、舒芜、许觉民、孙大雨、陈伯吹、黄秋耘等一些前辈学者都为这个栏目写来了文章。文章刊发后,在学界引起较大的反响。事过多年,还有读者记得这些文章,遗憾的是,这个栏目没有连续下来。

十几年过去了,当时我去组稿时见到的一些作家和学者,有的已经驾鹤远去,有的已经高龄并身体欠佳。作为20世纪的见证人,他们还想告诉后人一些什么呢?

现在,20世纪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了历史,成为了过去。那么,20世纪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纪呢?这是一个很难用几句话就说清楚的问题。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100年里受到的伤害是惨重的,是史无前例的,是灾难性的。他们的人格严重地被扭曲,尊严被践踏,信念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古代知识分子的替生民立命、替万世开太平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都被瓦解得所剩无几,然而,“士不可以不弘毅”,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反思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反思我们的灾难和不幸。而这个工作，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完成，因为替社会守护意义世界的是知识分子，能对历史及社会进行深刻反思的也只能是知识分子。“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与古代诗人美丽的缠绵和忧伤比起来，我们的“追怀”肯定要承受更多的心灵煎熬和内心冲突。但是，无论面对这个世纪的惨不忍睹的精神废墟，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难，需要付出多大的牺牲，我们都要有勇气面对，因为这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不能推脱的责任和使命。弗洛姆在《让人压倒一切》一文中说：“只有完全意识到人类的处境及其危险性，意识到一种能实现人类的自由、尊严、创造性、理性、正义和以团结为目标的新的远见，才能把人类从几乎注定腐烂、失去自由和自我毁灭的边缘中拯救出来。”是的，一切“拯救”都需要对“某种”处境和危险性的警惕意识，都需要“新的远见”，更需要存留他们对历史的一份真实的记忆，只有这样，我们曾经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才算得到补偿；只有这样，我们在已经到来的这个新世纪里，才有可能过上更理性更人道的生活，体验到更多的欢乐和幸福。

正是基于以上的想法和愿望，我邀请了百余位学者、作家、批评家，谈他们个人在 20 世纪的遭遇和体验以及对中国这 100 年的印象；陈述他们对知识分子问题、人生体验问题、教育问题及文学现状的认识和看法。从代际构成来看，从 1900 年到 1973 年，几代知识分子都被当作采访对象，以便全面地反映在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上留下的印象。对所有接受采访的人，我都心存感激，他们的真诚和认真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遭遇之不幸、经历之坎坷更是让人感慨不已；而他们真诚的和真实的表达也将成为特殊的心灵档案和精神财富。

我将这百余篇访谈称为《世纪印象——百名学者论中国文化》，我的问题大多是一样的，我想，百余人来回答同样的一个问题，会有百余种说法，这样，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每一位学者对中国百年历史的不同看法、认识和理解。本书的编排是以年龄为序，而不是以从事的专业分类，这样会形成一种历史感。为了更全面更真实地表现中国当代学者的思想和心路历程，我还编入了一些学者自述的文章，这其中，有的是我曾编发过的文章，有的是朋友推荐的文章，有的是学者自荐的文章，但整个体例、内容还是一致的。从这些文章中能够看出学术的命运、知识分子的命运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一定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大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聪明才智的发挥，很难不受这种大环境的制约。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太多的感喟。

我在每篇访谈文字的后面，附上了我的一个印象记，我想以一个编辑的眼光，为这些作家、学者、批评家画幅素描，力争用最平实的语言来真实地描述学者们最朴实、最生活化的一面，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他们在学问之外的东西，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当代优秀知识分子们的经历和思想及心路历程，认真地想想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了解我们应该如何度过已经到来的 21 世纪。

两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在与这百余位学者交流着，在对话的同时，我阅读了他们大量的著作和文章。慢慢地，我读懂了

他们的思想,觉得与他们的心灵接触似乎更近了一步。就在给出版社交稿临近的这些日子里,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幻觉:一个不是很大的会议厅内,坐着百余人,有的穿长衫,有的穿西装,有的穿中山装,还有的穿着很现代的流行装,唇枪舌剑一片嘈杂。我走了进来,于是有百余人的会议厅里突然停止了争论,大家开始注视着我。很久。

他们要向我诉说什么?

我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他们向我点着头微笑着,许久。然后慢慢地离开了会场。

这个幻觉的场面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出现。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而感伤,一种复杂的孤独感很强烈地向我袭来。于是我一次次地打开电脑,一遍又一遍地整理这些文字,就像为要出远门的亲人收拾行李一样,生怕有什么地方照顾不周。

在我编写这部书两年多的时间里,学界很多的前辈给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包括体例的编排,学者的人选等等,还有很多朋友在艰难的时刻鼓励我帮助我,在编写的整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東西。

毕竟我的能力和阅历是有限的,要想把几代学人对一个世纪的体验详尽地告诉给后人,还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做。

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真诚地道声:谢谢!

朱 竞

2003年5月25日长春

目 录

我的几句回答——访徐中玉	(1)
附:只有真实才得永恒	(3)
人·价值·尊严——访钱谷融	(9)
对时代的忧虑——胡晓明访王元化	(12)
知识分子的责任与精神——访许觉民	(18)
我这个人及我的诗——访牛汉	(27)
历史的解读与反思——访孙中田	(31)
花丛中的礼炮——访白桦	(38)
如此这般——李国文自述	(43)
梦醒时分——访张德林	(48)
“居然泪尽还一笑”——访阎纲	(67)
附:我吻女儿的前额	(76)
苦难与拯救——访钱中文	(82)
大半人生何所求——访胡经之	(93)
知识分子的天职——访吕家乡	(107)
关于世纪人生的对话——访李衍柱	(116)
像落花生一样——访王元骧	(127)
“老而不死”漫语——访林希	(135)
20 世纪的欢乐和悲哀——访黄修己	(142)
感性与理性——访童庆炳	(150)
对话的时代——访陈骏涛	(158)

灵魂的喜剧——访孙绍振	(170)
拒绝对历史的遗忘——访何西来	(178)
终生的事业——访杜书瀛	(192)
人格的力量——访张笑天	(196)
面对时代,我无地自容——访沙叶新	(203)
历史的迷雾——访余开伟	(209)
文学依然神圣——陈忠实自述	(222)
一个评论家的述说——访朱晶	(232)
地狱与天堂——访王学秦	(241)
附:生活的第一课	(252)
冷眼看人生 热情求真知——访曾庆元	(260)
上帝向人类的警告——访汤学智	(266)
只是为了尊严——访郭铁成	(274)
王府井大街六十四号——雷达自述	(289)
可悲的中国文坛——访尤凤伟	(297)
人类的危机——访朱立元	(306)
精神守望——访鲁枢元	(318)
我对“文革”的总结和反思——徐友渔自述	(322)
知识分子的使命、责任和处境——访刘纳	(329)
灵魂的白皮书籍——访夏中义	(341)
不求依附但求真——访丁东	(346)
编后絮语——赛妮亚	(357)

我的几句回答 ——访徐中玉



朱竞：徐先生，您认为知识分子精神存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您怎样理解？

徐中玉：知识分子精神是存在的，过去也有“士大夫”精神。良性发展的是有良知的，“行己有耻”，不屑取悦献媚于人，有正义感，谦虚，甘心过简单生活，好学深思。恶性发展的是在好听的名义下助纣为虐，落井下石，追求个人名利，几乎无恶不作。许多坏点子就是这种有知识的人提供的。因权贵略施小惠，便沾沾自喜。有的大致还正派，但封建思想严重：“以国士待我，而以国士报之”，感恩戴德，山呼万岁。不能说他们没有知识，只是愿卖与帝王家，品格不高。若说有真知识的才算知识分子，则过去数十年，无知的、伪知的太多，真知的极少。高压之下，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驯服工具充斥，主要是时代悲剧造成的。自然能独立不阿、和而不同、有高尚品格的为好。这样的人太少了。今后但愿能多些。大浪淘沙，才见真金，无须通通提名，像参加炒作。

朱竞：在您的人生经历中，最痛苦和耻辱的体验是什么？您最挚爱的对象是什么？

徐中玉：最大的痛苦和耻辱，是曾不能自由地呼吸，不说些违心的

话,就过不了关。这样无形的“关”过去是非常多的,你若完全说,就无所逃之于天地之间,除非你不活了,但活是天赋权力,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气死”才不值得,常有气的许多人活着,历史才继续得以发展,进步才无可阻挡。

我喜爱老老实实、勤勤恳恳、贯彻始终、为社会作些实事、好事的人。过中等水平的生活,可以不求人,可以自说自话,不管别人如何议论,尽其在我,就够了。

有君子之交直道而行,无话不谈,动静如意,如有这样的文化环境,差可满意了。

个人太渺小,谁也跳不出“大自然”的手掌心,“人定胜天”,只是人发现了大自然的规律才得以驾驭取胜的。“天人合一”,人在“合”上有所贡献,就不差了。

朱竞:您毕业于哪所大学?哪个专业?您一直在高校工作,在您看来目前的大学教育的主要弊端是什么?当前的文学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中存在着哪些问题?

徐中玉:我毕业于原中央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这已是60多年前的事了。

目前,大学教育主要的弊端在课程太多,学生自学时间太少。思想教育似乎可靠勉强灌输,而不必靠改革体制,权势者们以身作则达到目的。自己追求研究生数量太急,师资跟随不上,已到退休年龄硬性一刀切,实际浪费了许多尚可大用的资源,似毫不可惜。研究生毕业质量不平衡,差的太差,进来了都可以毕业。“博士”制度还用“单人”师傅带徒弟式,局限大。“博导”泛滥成灾。学术界腐败同样严重,各种评奖、选题基地……在职读博士,怪象百出。垄断、专制、人情、红包,上面似乎浑然不知,下面四处皆有,实则一查就清楚。

几乎没有树立起公认的权威选择。各大学重理轻文。学术研究滞后,思想观念陈旧,太不活跃,没有讨论风气,非常沉闷,不利于创

新、开拓。在这种种方面，都要引起重视，舆论的监督也大有必要。

朱竟：能不能举出几位您比较推崇的当代作家和批评家？您认为作为一个作家或批评家，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徐中玉：当代作家真有成就的有，太少。炒作、自命不凡者为多。这应由时间、自然淘汰之后来看，不要急急来胡乱推出多少“大师”。“大师”是自我努力，靠作品的持久和巨大的影响形成的，靠炒作、奖金、着力捧，是不成的。过去多年捧成了“真大师”的有谁？

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有高尚的人格，真才实学，有艺术追求，而且坚持不懈。作家不要成为八面玲珑的交际家，批评家不要成了逢人讨好的人物。小有成绩就自命不凡，还附庸起风雅来，开口就各种“主义”，不着边际，自命高深起来，恐已不太有效。现尽多从原一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创作，渲染官能欲念，总想抓住“卖点”。强调“自我”至此，在审什么美？我还是主张文学工作者需要做“改良人生”的人，负起应有的责任。

附：只有真实才得永恒

徐中玉

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1915年就出生了，但这个运动给我的最初影响也许只是得以进入了家乡新办的初级国民小学，改读到从“人、手、足、刀、尺”开始的语文课本。在此之前，我已在一家私塾里读了两个月。不过教我“人、手、足、刀、尺”课本的老师还是镇上那位清末的“秀才”先生，不仅同文学革命无缘，连当时最响亮的“科学”与“民主”他也未必听说过。

我是江阴人，江南一带即属乡镇也算比较开通的，但直到我初中

毕业，老实讲我还可说没有接触到“五四”后的新文学。读小学时不读，读初中仍在背诵《古文观止》、《古文辞观止》中的文章，《唐诗三百首》中的诗歌。只在课外偶读到些林琴南听人讲了译出的一部分小说，觉得很新鲜。鲁迅、郭沫若、茅盾、创造社、文学研究会、《新青年》、《新月》……这些人名、社团、刊物以至新文学书名，都还是到无锡去进了高中后才逐渐知道一些，这和语文教师的思想爱好分不开，因为在此之前的都是不同程度的老夫子，而高中时期遇到的第一位便是自己也已出版过白话小说的马仲殊先生。不少新书刊这时才得以自由地在图书馆里阅览到。借到什么就看什么，为人生的，为革命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也搞不大清楚其间多大区别，喜欢的就细看下去，不喜欢或不甚喜欢的便还掉另借。对鲁迅的《呐喊》、《彷徨》有的很明白，有的还看不太懂。郭沫若、郁达夫的好懂，订阅了一份《现代》，感觉有些写得新鲜。至于争论的问题，那时并无兴趣，一般都翻过不看的。直到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参加了赴南京的“请愿”等抗日活动，加上所订《生活周刊》的影响，思想才有点开窍，为人生，求进步，要抗日，才开始在脑子里扎下了一点根。1934年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之后，青岛直接处于日本侵略军控制之下，随时都有被找岔子派兵登陆凌压的可能，自己政府又那么不争气，便自然地在自己所学的文学这一行当内，逐渐形成了稍微清楚些的看法。

我觉得，文学必须是为人生，并为改善人生的。作品应该有感悟读者的艺术力量，光有革命的标语口号不行，但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痛苦生活而专去博取“高雅人士”、“贵族妇人”的欣赏，实在太萎靡无聊。文学不能脱离时代，不能不对国家、民族、人民负责，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要文学、文学家何用？我倒也不是要求文学一定得写某种题材，某一种人物，而是认为文学总该起促进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作用，这种作用能够在或大或小许多方面都显示出来。

我喜爱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即自觉站在人民群众的方面，

真实地描写出社会生活的本相的文学。我说的是要具有这样的精神，而非指某种比较固定一致的写法。具有这种精神的作家完全可以不断变换他的写法而取得多方面的经验和成功。在此特定意义上讲作家用一种主义来束缚自己，批评家用一种主义来议论作家，或者形式地看见提出的主义愈多便显得研究更深入、更活跃了，我认为这样即使不是存心自缚手足或想缚人手足，总不是切实、明智、有益的办法。关键在是否非常艺术地写出了社会生活的真实，没有隐瞒和欺骗。并非存心的隐瞒和欺骗，也不足取。

从这一角度来回顾抗日战争以前的文学，就我并不全面的感受而言，具有这种精神，关切人民命运而写的作品是有历史功绩的。反封建、反军阀、反侵略、反压迫、反专制的主题很鲜明，起了唤醒人民的作用，反映革命要求的作品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表达了一种新的远大的理想，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体验，这类作品一般显得内容单薄，一批东北作家的作品因有国破家亡、亲历战斗的切身之痛，起了较多的作用。关键即在其中的真实、热血丹心，与人民的思想感情密切相通，写出了时代精神。那个时候，目标很明确，日本侵略军和专制的统治者，作家就是站在它们的对立面，只要有可能便尽力揭露出它们的罪恶和卑鄙嘴脸。作家这样做是内外统一的，并从中得到了教育和锻炼。现代文学中大家公认的代表作大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决非偶然。人民欢迎这些作品，大家都支持这些作品。真实的作品才能具有雄厚的潜力。

在八年抗战中，大后方文学的主流还是揭发国统区的种种病态，少量得以传布的解放区文艺作品引起了大后方读者的浓厚的兴趣，看作为一种新的希望。某些新的文学理论观点也使人耳目一新，同时能够使人理解，在战争环境中首先得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过高的艺术要求和问题探索以后有的是时间。那时期我还辗转在西南一带，亲身体验到痛苦中对国家民族、文学事业充满新希望的喜悦：现实主义精

神终将得到最大的发扬！中国人民果然迎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的人民共和国！谁也没有多少联想到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塞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而总觉得杜甫的喜悦之情还远不能表达我们所感深切远大之情？开头几年那种真正“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朗朗乾坤的开国气象，上年纪的谁不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开始，多么难得的一个大发展、大凝聚的时机呵！

可惜，如所周知，没有多久，就接连不断，越来越令人不幸地痛心地遭到了或属难免而多半则由于人为失误所造成的挫折与灾难。在艰难环境中摸索出来行之有效的办法似乎都束之高阁了：调查研究啦、实事求是啦、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啦等等，“经典”上有的是，文件上还在讲，可在实际生活中到处充斥着这类表现。群众观点、群众路线难道就是运动群众？新的官僚主义在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土壤上又滋长严重，只是人们看到新官僚无恙，而揭发者却遭殃。满怀忠诚老实、知无不言，真以为诤友会受欢迎，不料引来的却是阵阵狂风暴雨，棍棒与帽子铺天盖地压下来的结果，一下子便成了飞沙走石万马齐喑人人噤若寒蝉的悲剧。那是一个对即使完全做错了也非得要欢呼“就是好，就是好”不可的年代。作家们当然首当其冲，于是，刚者折骨，媚者折腰，智者搁笔，一小撮时髦小生顿成驰骋一时的宠物——笔杆子，在他们“轻薄”的笔底下，横扫掉了多少文坛人物，几乎包括了现代文学史上所有建立了现实主义精神功勋而后来便再也写不出大作品来的人物。作家们的满腔热望，其实不过是希望能按艺术创作的规律来为新社会尽点力量罢了，绝未料到写出真实竟会成为一种罪状，胆敢越出雷池一步会遭灭顶之灾。很多“作品”成了推行“极左”的虚假宣传品，自然也就失掉了文学本性与人民的信任。回顾一下，在这不短的时期里除了几部描写过去斗争的作品还有一定的价值外，还留下了或留得下什么东西？为什么对这段令人痛心

的文学历史一直还不能有令人信服的总结,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呢?

没有真实就不能有文学。虚伪是不能持久的,作家只能服从生活的真理,作家应该有高尚的理想,还因为有高尚的理想和奉献精神他们才不能在种种腐败、口是心非的现象前面闭住眼睛,始终保持沉默。如果把恨铁不成钢的苦口良药也作为十恶不赦的毒物来打击,那就只能说明习惯于虚伪的时间实在太久了。是的,人民是文学的母亲,而真实的社会生活则是文学之力量与生命之基础。虚伪只能招来堕落、悲惨、失败。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为“真实”与“本质”作出了规定,制就了“高大全”模式。真实能够允许被人随心所欲作出规定和模式?如果可以,那么它们应该有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了,然而丑类们在聒噪一时后终于还得落花流水春去也了。真实原是只能让人民来判断,让时间来检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作为一个在本世纪已生活了 76 年而且还有可能看到本世纪最后几年情况的我来说,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跟许多同志一样,如此喜爱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与其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兴趣,毋宁说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这个世纪我们国家民族人民受到的灾难、变化特多,特大。人民受苦受难,英烈前仆后继,真是鲜血遍地,涕泪满怀呵!后死者显然还未曾给他们以起码应有的回报。大悲剧、大喜欢、大辛酸都有,应该、能够、而且非常需要写出大量的文学作品,为什么还未曾产生出来?现实主义这里讲得最多,落实了多少?狭隘的、跛脚的、一时有效的东西被当成了永远不可改变的普遍真理。不少条条框框仍在限制,而不是鼓励。不是没有一点成绩,一点进步,但躺在这一点东西上面自吹却只能越加落后。不是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吗?那就真正努力来做,而不要一味在口上纸上用功夫吧。在可预见的将来,我只期望在坚持改革开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积累中有所前进。对将来我抱乐观,形势比人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屈原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值得学习。

真实的才得永恒！让我们一同思考，一同求索，一同前进。

1991年7月29

徐中玉印象

徐中玉，男，1915年生，江苏江阴人。1939年毕业于国立大学中文系，1941年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建国前历任中山大学、中正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沪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到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授、系主任、文学所所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等职务。主要著作有：《鲁迅遗产探索》、《论苏轼的创作经验》、《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学术自选文集》等。

徐中玉先生，这位耄耋老人，给人的感觉是那么慈祥、和蔼，与他聊天的时候就像是在家里与家人说话，让你觉得心里踏实。其实我与徐先生有联系是在1991年，当时为了《文艺争鸣》“世纪印象”栏目组稿，我写信给徐先生。徐先生很快就把一篇《真实的才得永恒》的文章寄给了我。八年后的1999年夏天，我终于在南京见到了徐先生。当时我觉得他要比在照片上看到的风度更好一些。那一次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散步，我跟徐先生作自我介绍，他说他记得。事隔这么久，徐先生竟然还记起我曾向他组过的那篇稿子。于是，这一次我又是很胆怯地给他寄去了约稿信，没想到徐先生很快就寄来了手写的稿子《我的几句回答》。

在与先生通电话时，他说，现在身体非常好，他还在编辑刊物，看些书，有时还出去开会，再过几天就要开全国“作代会”了，他正在考虑是否去。他一生求得的是宁静的生活和做人的真实，他说：只有真实才得永恒。

人·价值·尊严 ——访钱谷融



钱谷融：朱竞先生，你的邀稿信写得很诚恳，所提问题也很有意义，我愿意尽我所知，竭我所能为你效劳。

朱竞：钱先生，您太客气也太谦虚了，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大家都知道，在您的人生经历中有过很多值得回忆的事情，那么您对中国20世纪的印象是怎样的？您认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存在吗？您最心仪的是哪一类型的知识分子？

钱谷融：我可以把你的这些问题归结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来作一回答。如果承认有“知识分子”这样一种类型的人存在，那么必有他们所持的精神。我认为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就在于他们代表着人所能代表的，当然是中国人的良知。他们立足于中国的土壤上，首先追求的也是中国人的幸福与进步。凡是以自己的一生，不懈贡献于这样追求的人，都是我所敬重的。鲁迅、胡适、陈寅恪，我都敬重。

朱竞：在您的人生历程中，您感到最痛苦和耻辱的体验是什么？能讲一件苦恼的事吗？

钱谷融：这又涉及到了人生和个人体验的问题。

我最痛苦和最耻辱的体验，当然是来自“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年来，什么样的愚昧、野蛮和荒谬的事都做得出来。譬如有所谓“早请